



# 张世英

讲  
演  
录

提高人生境界

张世英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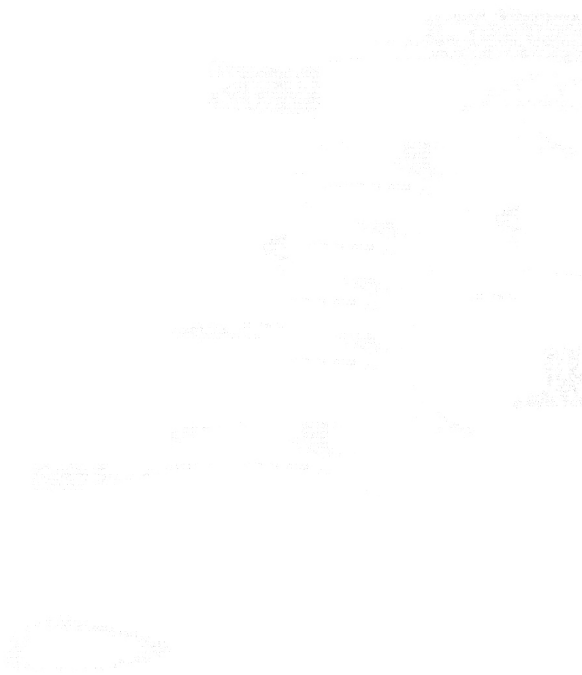
长 春 出 版 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ZHANGSHIYINGJIANGYANLU

# 张世英

## 讲 演 录



长  
春  
出  
版  
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世英讲演录/张世英著.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5445 - 1460 - 6

I. ①张... II. ①张... III. ①哲学—文集 IV. ①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8880 号

## 张世英讲演录

---

著 者: 张世英

责任编辑: 张中良

封面设计: 尹小光

---

出版发行: **长春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431 - 88561180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 130061

网 址: [www.cccbs.net](http://www.cccbs.net)

制 版: 吉林省久慧文化有限公司

印 刷: 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75 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 000 册

定 价: 36.0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0431 - 84519908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至今30多年来，我应邀到国内二三十所高等院校作学术讲演数十次；到国外，或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或在几所大学作公开讲演，共七八次；另外还在国内各种学术讨论会或座谈会上作过多次发言。这本《讲演录》虽然只能收录了这些讲演和发言中的一小部分，但大体上也能显示我近30年来的哲学足迹。

改革开放之初约八九年的时间里，我仍然在先前主攻的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领域里耕耘，所以这本《讲演录》专列了“黑格尔哲学”一篇。

80年代后期，我的研究范围逐渐转向西方现当代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兼及中西传统文化，致力于中西哲学、文化如何结合的问题之研究。我的目标集中到一点，就是想探索出一条中国哲学、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方向、新途径。我把哲学定位为提高人生境

界之学。我主张把西方传统文化中个体性自我的“主体性”精神纳入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奉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人我无间”）的思想之中，建立我所谓“万物不同而相通”的“新的万物一体观”。我想以此作为创建一种既注重群体意识又尊重个体性自我的“和而不同”局面的理论基础。我希望读者能从本《讲演录》第二篇“哲学与哲学史”篇（还有“博谈杂议”篇）的一些讲演中窥见我的这下心迹，有兴趣的读者还可进而翻阅一下我的其他专著，以具体了解我的哲学观和文化观。

我把审美境界看做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和一个民族文化的最高标志，我近些年来特别着力于美学思想的研究，这是本《讲演录》专列“美学篇”的意旨。

附录收录了我和一家报刊杂志记者的谈话，内容也是以我的哲学研究的心路历程和我个人所持的哲学观点为主。

《讲演录》所收录的讲演，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时，除个别情况外，都注明了引文出处。本书为简明通俗起见，删去了所有注释。

长春出版社和文化编辑室主任张中良先生约我编选这本《讲演录》，特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张世英

2010年6月4日于北京北郊静林湾

# 目录



前 言	1
博谈杂议篇	1
开幕词 / 1	
重读冯友兰的旧版《中国哲学史》 / 3	
顽石文化与钢筋文化 / 6	
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 7	
《哲学导论》课程开讲词 / 12	
怎样写学术论文 / 14	
西方哲学东渐百年之反思 / 23	
浅谈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互补 / 30	
哲学与哲学史篇	34
西方哲学史上的主体性原则与中国哲学史上	
关于人的理论 / 34	
海德格尔与道家 / 47	
超越自我 / 60	
康德和中国哲学 / 73	
哲学的新方向 / 77	
哲学的身份 / 90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 / 102	

人生的四种境界 / 112

我和我们 / 126

**美学篇** ————— **132**

审美—超越—自由 / 132

艺术哲学的新方向 / 143

现实·真实·虚拟 / 154

从科学到审美 / 170

西方后现代艺术的哲学思考 / 184

**黑格尔哲学篇** ————— **194**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序言” / 194

黑格尔国家学说中的“主体性”原则 / 213

黑格尔关于“反思”和对立统一的学说 / 232

黑格尔论人 / 244

精神哲学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地位 / 256

**附录 哲学乃提高人生境界之学** ————— **269**

# 博谈杂议篇

BOTANZAYIPIAN

## 开幕词\*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们很高兴地聚集一堂，召开这个国际德国哲学讨论会。首先，请允许我以《德国哲学》主编和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的名义向远道前来参加会议的德国、瑞士、法国、美国、日本的著名哲学教授表示谢意，向来自中国各地的著名哲学教授和专家学者表示谢意。

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德国哲学早已找到了最适于它生长的土壤。我这里还不仅仅指本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而且包括更早一些的以及当代德国哲学家对中国学术界的巨大影响。如果我们对中国任何一所高等院校中非哲学专业的同学们进行一次调查的话，就会发现他们最先能够想到的外国哲学家就是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如果我们注意一下我国中青年学者目前所表现出来的学术兴趣的话，就会发现胡塞尔、尼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弗洛伊德、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已成为大家谈论的中心。

德国哲学或以其批判的科学精神，或以其深邃的思辨，或以其对人

\* 1988年4月作者在武汉举行的题为“德国哲学中人的理论”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开幕词。



的生活环境和心理结构的细微体验而吸引着中国的哲学爱好者。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才发现在一切领域，无论是超越的还是实用的，是分析的还是想象的，都可以不断地从德国哲学中吸取智慧。

但召开一次专门的、有这么多外国学者参加的国际性德国哲学讨论会，在中国还是第一次。湖北大学举办这样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也是第一次。第一次总是有意义的。其意义不仅在以后的岁月里会通过第二次、第三次乃至更多次这样的会议得到体现，而且它本身就可以说明，只有哲学本身所具有的普遍性本质早已使我们处在相互对话之中，这才使我们有可能召开这样一次会议。

无论中德两国在历史上所形成的哲学形态和思维习惯有着多么大的差异，也无论我们在语言上有着多么大的障碍，我们都会发现正是差异和障碍才使我们彼此渴望交流。我相信，当我们大家面对面地在一起交谈时，一定能寻找到许许多多超出语言之外的有价值的东西。

关于人的哲学问题不但是近现代德国哲学的一个主题，也是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很自然地在这次国际会议中，它不但是我们进行学术交流的一个中心，而且是我们在彼此的交谈和理解中达到相互沟通的一个现实内容。我也相信，人的解放将成为我国思想界今后的一个主要课题。歌德曾经说过，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绿。在反复的辩驳和争论中，死去的只会是理论而不是我们。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我们对这次会议的成功充满信心。

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宁、众说纷纭的星球上，哲学从来就是一个既给我们带来烦恼，又给我们带来希望的领域。一切有幸进入这一领域的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追求和困惑。当我们不得不对于日常事务予以多大的重视时，我们会发现我们无法赢得内心的宁静，无法使哲学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当我们摆脱了日常生活中急迫的兴趣后，又会觉得精神失去了它的实体性内容，而感到空疏。但无论如何，我们总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去对待和思考这个时代向我们提出的一切问题。这是哲学得以兴盛发达的真正基础，它既是德国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也会成为我们这次会议的一个突出的特色。我想就以这种精神宣布这次会议开始。

谢谢大家。

## 重读冯友兰的旧版《中国哲学史》\*

去年春天，我赴美国参加第8届国际康德哲学大会。我的发言结束后，有一位美国学者在提问时谈到，他是冯友兰的学生，冯在30年代~40年代出版的那部《中国哲学史》至今仍是美国一些讲授中国哲学的教授指定学生必读的参考书。他的一番话引起了学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许多回忆和想法。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念哲学系时，冯先生讲授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就是以这部《中国哲学史》为教本。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大学联合组成。学生中盛传北大重史，清华重论；哲学系的清华教授以金岳霖和冯友兰为两大台柱，金先生研究逻辑学，冯先生把逻辑方法应用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两人都重理论、尚分析，形成了清华学风的重要特点之一而为学生所称道。我亦因此在保送读研究生时选择了清华研究院，近十多年来，我致力于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德国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结合，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又成了我经常翻阅的对象。

《中国哲学史》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部把中国传统哲学放到世界特别是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大视域来加以系统考察的哲学著作。冯先生受西方新实在论的影响较深，在他关于中国哲学史上许多思想学说的解释中，新实在论的观点随处可见，对公孙龙的白马论和朱熹的理气说的解释，其尤著者。我看其他一些讲中国哲学史的书，都觉得理论分析少，不甚了了，唯独听冯先生的课，读冯先生的书，才觉得他对于许多中国思想学说的解释清楚而有说服力。尽管我们今天，甚至冯先生本人在后来，已经超出了或者抛弃了他原来的不少解释和结论，特别是他的新实在论的观点，但他把中国哲学同西方哲学联系起来作系统研究的这

\* 1996年12月作者在冯友兰诞辰101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一基本思路，却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航道、新方向，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仍有很现实的意义。

中西哲学与思想都是整个人类思想的同一棵大树上的枝桠，它们虽各不相同而又相通。冯先生并不否认哲学思想的民族性，但他更注重时代性，他认为东西思想文化之差异在许多点上表现了整个人类思想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之差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下卷第495页）。冯先生的这一观点，同他把中国哲学史纳入整个世界思想发展的大视域中来考察的思路是分不开的，很值得我们重视和参考。

冯先生把历史分为“历史之自身”与“写的历史”，与此相应，哲学史亦可分为“哲学史之自身”与“写的哲学史”。“哲学史之自身”只有一个，而“写的哲学史，亦惟须永远重写而已”（同上，上卷第21页）。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冯先生所倚重的西方哲学思想仍属西方传统哲学的范畴，主要是柏拉图主义，他当时抱有康德的“物自身”的思想，还不可能知道今日西方之诠释学哲学已不断批评了所谓“历史之自身”的抽象性和狭隘性，诠释学哲学认为凡够得上称为“历史事件”的历史，其所谓“自身”也不是孤立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开拓自身、更新自身的。但冯先生强调的“写的哲学史”“须永远重写”的观点却与今日西方诠释学哲学的上述思想有近似之处。有人把西方诠释学哲学的历史观解释为历史可以任意打扮，这当然是误解和曲解。而冯先生在强调“写的哲学史”“须永远重写”的观点的同时，亦非否认“信史”，他甚至斥责那种“本无意于作信史之流”，“当然可以不论”（同上，第19页）。

冯先生的那部《中国哲学史》继承和吸收了中国传统著作方式的优点，引证了大量原文，让读者可以“直接与原来史料相接触”，但冯先生并不满足于此种“选录式”，他同时采取了西方哲学史的“叙述式”（同上，第22页），用自己的语言讲述了他自己的大量新颖的见解，而且在这里，特别表现了他运用逻辑方法作细致的现论分析的清华学风。与当时其他许多哲学史著作相比，他这部著作的理论性是最强的。他的《贞元六书》的核心著作《新理学》可以说是他的《中国哲学史》的理论基础，前者所讲的理论的思想清晰地贯穿于后者之始终。不懂冯先生的哲学理论著作，就不能真正懂得他的哲学史著作。

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方面的造诣，同他的中国古典文学与外文方面的功底是分不开的。冯先生能诗善文，他为西南联大所撰写的纪念碑文为海内外学者所称道，便是一例。他的哲学和哲学史著作虽重概念分析和逻辑推理，但从字里行间，亦可窥见其在中国文学方面的素养。我们今天提倡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很有必要的。不能设想，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对本民族的古典文学和文字方面的修养甚差而能真正领会和弘扬民族的传统思想和文化；不能设想，一个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学者缺乏中国古典文学方面功底而能对哲学史的研究有真正可观的造诣。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包含一条重要的举措，就是加强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以至研究生在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字方面的训练和修养。像冯友兰先生这样的大师是我们学者的榜样。

冯先生的英文很好，是他熟悉西方哲学并能把中国哲学放到世界思想文化发展的视域中来加以考察的重要条件之一。我在西南联大时曾亲自见到过冯先生在讲演中与一位英国学者用英语进行流利对话和辩论的场面。我还亲自听到闻一多在讲中国古典文学课时曾大力主张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应熟悉外文，把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结合起来。闻一多、冯友兰的教导和榜样，多么值得我们深思啊！

## 顽石文化与钢筋文化\*

五十多年前在西南联大求学，第一次到昆明，看到的是云南文化的原始性和古朴性，石林可以说是原始性的一个标志，少数民族的民俗可以说是古朴性的代表。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来到昆明，看到的是云南文化的现代性，甚至是国际性，钢筋水泥和玻璃建筑起来的高楼大厦已布满全城，世博会所表现的国际性，已经不是其他大城市可以比拟的了。半个世纪的前后对比，使我想起了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一个比喻：文化似乎可以有顽石的文化，也可以有钢筋水泥的文化。顽石是没有经过现代文明雕琢的，所以古建筑大都是用顽石建成的，代表一种粗朴、深沉的性格；钢筋水泥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代表一种锋芒毕露、显现于外的性格。现代的人们久居钢筋水泥和玻璃建成的高楼大厦，往往有城市喧嚣，陷入名缰利锁之中的感觉，于是又向往到高山雪峰之巅，去享受一种回到大自然的母亲怀抱的感觉。所以，未来理想的文化应该是把顽石的文化与钢筋水泥的文化结合起来，把文化的原始性和古朴性同文化的现代性和国际性结合起来。云南文化的原始性和古朴性乃是其他各省所罕与匹敌的，如果能充分利用云南省的这种优势，把它加以现代化的雕琢，必将显示未来的云南这个文化大省的特色。这就既需要有现代科学的智慧，又需要有高度的艺术修养。我希望云南人民运用科学和艺术的手笔，把云南建设成全国独具特色的文化大省。

---

\* 2000年8月作者在云南省文化建设高级研讨会小组会上的发言。

## 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古代哲学长期以“万物一体”、“天人合一”为主导思想，类似西方近代主客二分式的“天人相分”模式不占主导地位。鸦片战争以后，一批先进的思想家认识到，要想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不仅要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的科学技术，而且要学习与之相联系的西方近代的哲学思想。他们着力介绍西方近代哲学主客二分式（即主—客关系式）和与之相联系的主体性哲学。例如，梁启超就曾以介绍西方近代哲学“初祖”为题，撰文盛赞笛卡尔和康德的主客二分思想和主体性哲学；谭嗣同则强调“我”与“非我”之分，高扬“心”之力亦即主体性；孙中山明确提出精神、物质二元论和“精神胜物质”的主张。从哲学角度看，“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这两大口号，就是召唤西方近代主—客关系式的主体性哲学：科学就是要发挥人（主体）的主体性以征服自然（客体），民主就是要发挥人的主体性以推翻封建统治，两者都是强调以主体统一客体。可以说，一部中国近代哲学史，就是学习和召唤西方近代主—客关系的思维模式和主体性哲学的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近代哲学史上伴随主体性哲学的发展而日益突显的是“主体性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其最早的根源是柏拉图的“理念”说）关注超感性的、抽象的概念世界并把它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把哲学变成远离现实、令人见而生畏的学问，使人生变得苍白无力、枯燥乏味。因此，我们不能亦步亦趋地沿着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及其形而上学的老路走下去。

正当我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努力学习西方近代哲学之际，西方哲学史已于19世纪中叶发生了重大转折：自黑格尔死后的19世纪中叶起，西方开始了一个反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新时代，这也就是我们中国

\* 2001年4月作者在上海举行的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讨论会上的发言。

学术界习惯称为“西方现代哲学”的时代，它与近代相对峙。这个时代哲学派别林立，异说纷呈，但大体上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反对抽象性，提倡现实性，要求哲学从抽象的概念王国回到现实的人世，要求哲学与具体的人生相结合，把人生变得富有情趣和诗意。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诸多现代哲学派别都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产生的，都是这同一个时代的产儿，都具有上述反形而上学性和抽象性、主张具体性和现实性的特征。可以说，时代决定了它们是天生的盟友。但是两者在这方面所走的道路又是大不相同的，其中最根本的一个不同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其他西方现代哲学派别仍然停留在用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这一旧的窠臼之中，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把自己的任务规定为以革命的方法改造世界。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革命变革的时代，因此，“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哲学既需要继续学习西方近代的主体性哲学，又需要避免这种哲学所带来的形而上学抽象性；既需要学习西方现代哲学的具体性和现实性，又不能采取西方现代哲学那种只停留在说明世界而不注重以革命方法改造世界的旧观点。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哲学的发展终于在各种西方现代哲学派别纷至沓来之际选择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主体性原则，又反对主体性哲学的形而上学抽象性，因而具有具体性和现实性精神，更进而主张以革命的方法改造世界。我以为，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在西方现代其他各种哲学纷呈于中国当时思想界的局面中独占鳌头的原因。

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它是中国人民的主体性的一次大解放运动，但很快就受到各种“左”的教条主义的干扰。包括哲学在内，我们在各个方面的进展都大大地被推迟了。单就哲学来说，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如下必须正视的问题。

一、只重认识（知），不重情、意。过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只是讲主体如何认识客体，以便掌握客观规律，征服客体，使客体为我所用；人变成了单纯进行认识活动（包括利用、使用等实践活动）的机器，至于人的情感意欲则被视为妨碍客观认识的主观的东西而加以贬抑，甚至连美学也被认为是主体认识客观事物规律之学的认识论。在那

个时代里，谁如果写出诸如恋爱哲学、死亡哲学、民胞物与哲学、潜意识哲学之类的著作，即使不被扣上资产阶级哲学或反动腐朽哲学的帽子，也会被斥为小资产阶级意识或缺乏阶级斗争观念。其实，正如德国现代哲学家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所说，人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因人生的态度而具有双重性：一是“为我们所用的世界”，一是“我们与之相遇的世界”。前者是一种把世界万物当做经验、认识和利用对象的态度，后者是一种以仁爱对待人和物的态度。不认识和利用对象，人固然不能生活，但仅仅依靠这种态度来生活的人“不是人”。布伯的哲学及其表述虽有宗教神秘之处，但他的基本思想却启发了我们：一个只重认识和使用、不重情感意欲上的互尊互爱的人，是不能在灵魂深处与他人赤诚相见（“相遇”）的，这样的人是片面的因而也是抽象的人，而不是具体的、现实的人。一种只重认识、使用而不重情感意欲、不重灵魂深处相见相遇的哲学，必然把人生的意义和空间变得异常贫乏、狭窄和枯寂。

二、只重生产，不重生活。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实践，这既是它的内在机制，也是它和其他现代哲学流派重现实、反抽象的表现，是两者的一个结合点。但我们过去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把实践狭隘地理解为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至于日常生活中其他丰富多彩的活动（例如艺术活动、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往以及饮食男女之事）则都被视为卑微的、琐屑的活动而加以贬斥。西方现当代许多哲学流派强调：人类的实践活动不仅像近代哲学所注重的那样，是人与自然作斗争的生产活动，而且包括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活动；我们不仅应当认识到，寻找自然界的普遍性、规律性以发展生产，其目的乃是为了生活，而且更应当认识到，生活的内容既包括消耗自然物，还包括各具独特性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与此相对照，过去那种只重生产、不重生活的观点显然是片面的。至于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更为错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我们为什么不能吸取西方现当代其他哲学流派关于“生活世界”的观点以扩大实践的内涵，让人们的生活内容更丰富、更美好呢？

三、讲主—客关系而不讲主体性。过去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不外是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以及主体能否认识和如何认识客体，并通过认识、实践以达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这套原理基本上属于西方



近代哲学的主—客关系式。然而我们都知道，主—客关系式是“主体性哲学”的思维模式，其重要特征是强调主体性。“主体性”是西方近代哲学的根本原则和专门术语，意指主—客关系中主体的特性：除过去教科书所讲的主观能动性之外，还有个人的独特性包括个人独特的才能、禀赋等，以及自由意志、独立思考、不依赖血统或出身等等。主体性与主—客关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这一点，海德格尔在《黑格尔的经验概念》一文中已讲得很明确。可是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却限于主—客关系的框架，而又不讲它所包含的本质环节——主体性。我个人那时讲黑格尔这样一个集主体性哲学之大成的哲学家，也不讲主体性。直至80年代初，我们的学术界才开始讨论主体性问题，而我们当时对西方在几百年前已经建立起来的主体性原则和这个专门术语的本义并不清楚，甚至把主体性理解为主观武断和主观唯心主义。改革开放以前，我们讲的是阶级出身决定人的命运，一切服从组织安排，以及驯服工具论等等，没有人的主体性可言。我想，也许这就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讲西方近代哲学的主体性精神的根本原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按其本质和本义来说，应该是包含了近代哲学的主体性精神的，尽管它产生于19世纪中叶西方近代哲学终结以后。

尤有甚者，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产生的西方其他许多哲学流派（这里主要指欧洲大陆人文主义思潮中的一些流派），已经超越（不是抛弃）西方古典的主—客模式和主体性哲学，它们强调主客不分或主客的融合一体（这种一体不同于主—客二分式中的主客统一），有点类似王阳明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思想，亦即他所讲的“天地万物不能离却我的灵明，我的灵明亦不能离却天地万物”，两者一气流通，无有间隔。为了区别起见，我把包括王阳明在内的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称为“前主—客式的万物一体或天人合一”，而把上述西方现代哲学所讲的超主—客关系式的主客融合称为“后主—客关系式”。西方现当代哲学流派大多主张主客融合优先于主—客关系，认为前者是第一位的，后者是第二位的。例如海德格尔讲“上手的東西”优先于“在手的東西”，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美国哲学家梯利希（P. Tillich）更明确地断言，“自我”与“世界”的融合一体是第一位的，“主—客关系”是第二位的。而过去我们讲哲学，总是把西方现当代哲学流派所主张的主客融合一体的思想当做主观唯心主义大加挞伐。实际上，这种观